

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雏形

——哲学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种类”说

李建忠¹, 刘小梅²

(1. 浙江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3; 2. 南昌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47)

摘要:五四前后的冯友兰先生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以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 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思考的过程。在对东西文化差异根源的解释上, 他否定了以“地域”差异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 提出了不同民族的基本思想造成各民族文化差异的“种类”说。

关键词:冯友兰先生; 文化哲学思想; 哲学与价值观; “种类”说; 雏形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2)01-0015-05

关于冯友兰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他自己在晚年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他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 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个问题而来的, 我开始认真地研究他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 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 就是说, 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 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 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 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 就是说, 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1](349页)在这里, 冯友兰先生把其文化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概括为以“地理区域”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异, 应当说, 这一说法是不够明确的。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及其根源的看法基本上还处在萌芽阶段, 没有形成成熟的见解。即使有, 也还只是对近代以来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的“中西”论争的怀疑与思考而已。这完全可以从他与印度泰戈尔的对话中找到证据。更何况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已指出:地理、气候等因素都只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 而不是必然的条件。那么“地

理区域”说(以下简称“地域”说)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本文所要作的就是要进一步澄清“地域”说的具体含义, 更准确地展示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雏形。

冯友兰先生对东西文化问题的探讨, 是在他1919年冬到达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此时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 也是东西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时期。围绕着东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 当时国内的学者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当时国内流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文化“种类”的差异, 即东西文化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 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文化“等级”的差异, 是“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差异。持前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东方文化派, 他们大多数主张要走东西文化的调和之路, 从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化, 为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铺平道路。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则主要是西化派, 他们大多数主张抛弃传统中国文化, 全面向西方

收稿日期:2001-09-26

作者简介:李建忠(1970—),男,江西宜春人,哲学硕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刘小梅(1971—),女,江西宜春人,中国哲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

学习,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场文化论争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以后仍未停止,对青年冯友兰先生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青年冯友兰先生正是带着对这场论争的思考到美国去求学的。对此,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忆说:“……这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从1919年我考上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2](187-188页)

初到美国后的冯友兰先生和西方有了直接的接触。这时,东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对他就更显突出了。他开始比较中美文化,经过比较,冯友兰先生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发展迅速,这种繁荣富强和中国的贫弱更是对比鲜明。这就再度引发了他对东西文化冲突的深思:“自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节节失败,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西方同中国比起来究竟在哪些根本上比较优越?”^[2](198页)带着这些问题,青年冯友兰先生于1920年11月拜访了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冯友兰先生向泰戈尔先生请教了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的问题,并写成了《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一文。在该文中,冯友兰先生首次表达了他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的怀疑。

在《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一文中,冯友兰先生向泰戈尔提出了对东西文化差异“等级”说的质疑。他是这样说的:“我近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差异,是等级的差异(Difference of degree),是种类的差异(Difference of kind)?”^[3](2页)对于这个问题,泰戈尔先生回答说,这是种类的差异。他认为“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Activity),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Realization)。西方讲活动进步,而其前无一定目标,所以活动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依东方之说,人人都已自己有真理了,不过现有所蔽;去其蔽而真自实现。”^[3](2页)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说,东西洋文明的差异乃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差异,是不同文化种类之间的差异。这实际上和当时中国流行的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是大致相同的。对泰戈尔的回答,冯友兰先生并没有表示认同,也没有表示反对。他接着问泰戈尔另一个问题,他问道:“中国老子有句话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西方文明是

‘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是不是?”^[3](2页)这实际上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其意即是问,西洋文明是不是一种向外求不断增加“富力”,讲活动进步的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则是一种向内寻求内心的平静的精神文明?对此,泰戈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在肯定这一差别的同时,又为东方文明作了一个辩护。他说:“……东方人生,失于太静(Passive),是吃‘日损’的亏不是?太静固然,但是也是真理(Truth)。真理有动(Active)、静(Passive)两方面:譬如声音是静,歌唱是动;足力是静,走路是动。动常变而静不变;……东方文明譬如声音,西方文明譬如歌唱;两样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inertia);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Wisdom),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Activity)。”^[3](3页)这实质上就是说,东方文明并不是落后于西方文明。尽管它“失于太静”,但也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它和西洋文明的关系就好像是声音与歌唱、足力和走路之间的关系一样,一“静”一“动”,是构成“真理”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因此,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需要东方“精神文明”来弥补;而东方“精神文明”的缺陷也需要西方“物质文明”来填充。这大概就是泰戈尔想要阐明的意思。其实质还是东西洋文明的调和论。泰戈尔关于东西文明差异的解答,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流行的看法,这当然也就不能给青年冯友兰先生很大的启示。倒是在另外两个问题上,泰戈尔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冯友兰先生的心,并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泰戈尔关于“东方文化什么该存,什么该废,应该用东方人的眼光来研究决定,而不应当听信西人模糊影响的话”的观点。泰戈尔的这一看法使青年冯友兰先生觉得东方文明无论怎样,总该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事实。他认为无论什么科学,只能根据事实,不能变更事实。科学就是人们把事实研究之后,用系统的方法对它的记述和用道理对它的解释。对自然事实的解说和记述,就是自然科学;对社会事实的解说和记述,就是社会科学。人们的记述和解说也许会错,但事实不会错。因此,对待孔学,对待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人们若是把它们看成一种道理,它们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但若把它们当成了事实看,它们就无所谓对错了。这样一来,作为宇宙间的事实的一部分的东方文明,不仅东方人要研究,西方人也需要研究。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冯友兰先生对东方文明与文化的态度就

已显示出其独特之处了。这一思想在后来更是发展成为他以客观态度来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为学原则和研究方法。

其次是泰戈尔关于中国如何改变自己,适应时代的“忠告”。冯友兰先生问泰戈尔:“依你所说,则东西文明,将来固可调和;但现在两相冲突之际,我们东方,应该怎样改变,以求适应?”^[3](4页)泰戈尔先生的回答是简单明了的,他说:“我只有一句话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学。”^[3](4页)泰戈尔先生的这一忠告深深地触动了青年冯友兰先生,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或许正是受了印度泰戈尔先生的影响,冯友兰先生开始思考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的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呢,还是因为中国有能力而不为之?经过一番思考,冯友兰先生认为应当从中国哲学中寻找答案。为此,他对中国哲学作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的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即《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在这篇论文中,冯友兰先生首次表达了他对东西文化冲突的独特见解,也展现了他的中西文化观的雏形。

二

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冯友兰先生指出:“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是旧的,而西方各国已经是新的。是什么使中国落后了?这自然是一个问题。”^[3](31页)在当时的国内外,人们对东西文化比较的结果大都认为两者是不同种类的东方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只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认为东西文明是不同等级的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的差异,不过,他们对此并未进行理论上深入的探讨。冯友兰先生在经过一番研究后则发现东西文化在文艺复兴以前是处于同一水平上的,那时,两者之间的差异完全是属于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这种差异发生了变化,中国文化,或可以说是东方文化,仍然是旧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已经是新的文化了。这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种类”的差异了,而且也是新旧的差异了,也即是“等级”的差异了。这种把“种类”与“等级”结合起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

的观点在当时看来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呢?冯友兰先生认为应当从中西哲学中寻找答案。他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但是什么是幸福?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远非一致。这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哲学体系,许多不同的价值标准,从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3](32页)这就是说,造成中西文化差距的根源不在地理、气候、经济等条件,而在于人们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而人们对幸福的标准则取决于他们的价值标准。因此,归根到底,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价值标准,造成了中西文化在近代的差距。而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呢?冯友兰先生认为是因为中国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这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不是因为她不能,而是因为她能之而不为。为了证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作了一番全面的研究。

经过深入的研究,冯友兰先生发现中国哲学历来存在两种一般的趋势:即“自然”与“人为”,也就是“天”与“人”。“天”即指自然的东西,是先天就存在的;而“人”则指人为的东西,是经过后天的努力得到的。在我国周朝的晚期,也正是欧洲雅典文化的繁荣时期,随着各种思想学说的相互竞争,逐渐形成了最有影响的三家,即道家、墨家、儒家。这三家在思想趋势上则表现为: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则主张“自然”和“人为”的调和,即“中道”。由于这三家思想趋势各异,因而其对“生”与“幸福”的看法和标准也就各有千秋。

道家主张“复归自然”,并认为是全能的“道”给予万物以其自己的“自然”,因此,万物在其“自然”中即可得到自己的满足。在道家看来,任何人类道德、社会制度都是违反“自然”的,因此,人们应当做的,就是要遵循他自己的“自然”,并满足于“道”对自己的安排,把人为地加在“道”上的东西去掉,而不是人为地在“自然”上再加上些什么。这即是老子所主张的“为道日损”。因此,在道家看来,“生”的意义就在于“复照自然”。只有不断地追求“自然”,人生才能得到幸福,而那些有志于“为学”的人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既然“道”已给了万物以“自然”,那人们对“自然”的追求也就不必向外求了,而只需向内寻求就够

了。

墨家持与道家相反的意见,主张“人为”努力,反对回归“自然”。冯友兰指出: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鉴定道德,不在于它是自然的,而在于它是有用的。他指出:“《墨子》有两句话说:‘义,利也。所得而喜也’。所以墨子在伦理学上的立场,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立场。”^[3](37-38页)不只如此,冯友兰还认为墨家的哲学中有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墨子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最后,他总结墨家说:“无论如何,墨子确实是一位教导人们在外界求幸福的哲学家。他不像道家那样想,他不以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不以为人需要做、应当做的是复归自然,相反地正是要摆脱自然。与道家相反,他知道人性不完善,愚而弱;为了变得完善、智而强,就需妄国家、道德、人格化的上帝来帮助。所以在墨子哲学中有一种很强的进步感、未来感。”^[3](41页)这就是说,墨家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摆脱自然的束缚,并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向外界寻求幸福。

关于儒家,冯友兰认为他们主张的是“自然”与“人为”这两派观点的调和,即主张“中道”。儒家思想的发展始于孔子。孔子有倾向于“自然”一派的发展趋势。到孔子以后,则出现了观点相分离的两派。一派以孟子为代表,其观点较接近“自然”;另一派则以荀子为代表,其思想则偏向于“人为”。孟子一派主张人性本质上是至善的。不过,这并不是说人生来就是完善的。人要使自己完善,就必须消除自身所有的低级欲望,使内心的理性得到充分圆满的发展。所以人要使自己成为“完人”,更重要的是应当“求其在我者”。“人不能控制在他之外的东西,这个情况并不一定使它不能完善;他的内心有上天赋予的天理,他可以从中获得真理和幸福。”^[3](45页)这也就是说,孟子一派主张幸福和真理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有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外部世界里,才能求得幸福和真理。荀子一派的主张则偏向于“人为”的路线。他们认为人类要做的是征服自然,而不是要复归“自然”;人性本质上是恶的,需要后天“人为”的改善。所以人们必须征服自然界,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幸福。

以上是冯友兰对儒、道、墨三家思想的静态分析。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三家思想并没有互不相干地存在下去;相反,三家为了各自的生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墨家完全失败了,并不久就永远消失了。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家主张“人为”路线的哲学流派的消亡。后来,儒家中倾向于“人

为”路线的荀子一派,也由于后学的荒废而消失了。这样,“秦王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3](47页)这就是说经过动态的演变,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三大类就只有“自然”的道家与儒家中亲“自然”的一派得以留存下来。

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极端“自然”的佛教哲学,这更使得中国人的心灵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徘徊于儒、释、道之间。历史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家,宋儒们进一步发展了“自然”哲学。他们把儒道释三者合一,建立了宋明道学,并更加有效地把“自然”的哲学思想输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和西方一样伟大的民族就一直以全部的精神力量致力于“自然”这一思想路线,并力求直接在人心内寻求善和幸福,寻求永久的和平。

而西方的哲学思想,则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冯友兰认为,西方在基督教创立之前,欧洲也存在着“自然”的哲学思想路线,如斯多葛主义就教人们事奉他们心内的神。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却将注意力由人身上转到了上帝身上,然后又由上帝身上转移到了外在的自然界。他们转而教人事奉上帝,认为人已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罪人,这样,欧洲的心灵就为外在的上帝所占据了。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哲学家们发明了逻辑的方法和探讨自然界的方法。当欧洲人再次把注意力从上帝身上转移到外在的自然界时,这种逻辑的方法和探讨自然界的方法则给他们带来了认识外界、证实外界的科学的精神。自然界取代了上帝在人们心灵中的位置,人们转而开始认识和证实自然现象。正是这种对上帝和自然现象的认识和证实,注定了他们需要科学。作为科学,其根本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精确,并增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用笛卡尔和培根的话说,就是“确实性”和“力量”。这就是说科学的产生是应人类对外在的自然现象或对自身物质有机体的研究与探索而产生的。从西方哲学走过的历程看,他们的一切哲学,无论是信仰外在的上帝的哲学,还是探索自然界的哲学,其思想所走的都是“人为”的路线。正是因为他们主张“人为”,承认人自身的不足,才使他们渴求得到外物的帮助,这个外物,先是上帝,后来是科学。

而在中国,如前面所叙述的,哲学家们强调的不是对外物的认识,他们不是为了要征服自然界。他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回归到自己的“自然”,如

何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心,从而进一步战胜自我,以求得内心理性的幸福。既然如此,他们也就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当然也就不需要科学了。因此,冯友兰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3](51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3](32页)

三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对待东西文化差异的问题上,此时的冯友兰先生是主张用各民族的基本思想,即他们的哲学、价值观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那么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忆的“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到底是何种意义上说的呢?事实上,此时的冯友兰先生是不同意用地理区域的差别来解释文化差异的,这正如他所说的“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不是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3](32页)这正好说明了冯友

兰先生对五四时期国内流行的把东西方文明的差别看成是“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之间的差别的地理区域差异论的否定。因此,我们认为冯友兰先生这里所说的“地域”差异并不是单纯的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差异意义上的“种类”差异说。因此,准确地说,五四前后的冯友兰先生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以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思考的过程。在对东西文化差异根源的解释上,冯友兰先生否定了以“地域”差异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民族的基本思想(包括哲学、人生观、价值观等)造成各民族文化差异的“种类”说。正是这些主张,构成了冯友兰先生早期的东西文化观,即冯友兰先生东西文化观的雏形。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The Rudiments of Mr. Feng Youlan's Cultural Philosophic Thought —The Theory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Peoples' Philosophy and Value on Life

LI Jian-zhong¹, LIU Xiao-mei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jia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Hangzhou, 310033,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it was a popular proposition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th the theory of kind. With respect to Mr. Feng Youlan, he came through a conversion from suspecting to reflecting it. On interpreting the origi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e advanced that not the theory of regions but the different nation's basic ideology brought for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 Mr. Feng Youlan; Cultural philosophic thought; philosophy and value on life; difference of kind; rudiments

(责任编辑 杨雪晴)